

文艺论丛

7

文艺论丛

· 7 ·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一九七九年八月

目 录

文学的党性原则

- 学习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札记 王春元(1)

试论郭沫若从探索到贯彻工农兵方向的贡献

- 兼及思想发展之一二问题 马良春(31)

论老舍剧作的艺术风格 陈瘦竹 沈蔚德(60)

“哦, 你是你父亲的儿子”

- 谈《雷雨》中的周萍 钱谷融(97)

黄宾虹论国画艺术 袁柱常(111)

十八世纪德国启蒙运动的美学思想 汝 信(121)

黑格尔的《美学》译后记 朱光潜(175)

黑格尔《美学》札记两则 王元化(206)

十九世纪前三十年法国青年的悲剧史

- 漫话巴尔扎克的《幻灭》 程代熙(221)

拉法格的民歌和神话理论 刘锡诚(250)

论刘白羽散文的艺术风格 吴周文(268)

论杨朔散文的风格 邓星雨(289)

美不会毁灭

——杨朔的散文艺术 吴欢章(319)

革命英雄主义的壮丽颂歌

——读峻青的两本再版小说集 周献明(337)

真实地塑造英雄人物形象

——读《在大革命的洪流中》偶感 朱彦(357)

对我国奴隶社会青铜器艺术审美观念的

一些探索 于民(387)

中国神话对于后世文学的影响 袁珂(410)

论《文心雕龙》的文学史观 张文勋 杜东枝(436)

《太平广记》随札 蔡国梁(455)

关于曹雪芹的几个问题 冯其庸(482)

亚·法捷耶夫书简三则..... 臧乐安 范信龙 井勤荪译

致伊万·卡尔波维奇(96) 致H·A·奥斯特洛夫斯基(110)

致米·伊萨柯夫斯基(174)

英国出版《中国戏剧史》 (288)

法国出版《皮影》和《说唱与百戏》 (409)

文学的党性原则

——学习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札记

王 春 元

党的文学的原则，或通常称之为文学的党性原则，是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一文中首次提出，而后来为毛主席结合我国文艺运动实践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一个基本原理。

多年来，林彪、“四人帮”一伙，横行霸道，宰割文坛。他们为了篡党夺权的反革命政治目的，不择手段，千方百计地阻止文艺工作者和人民群众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论著，肆意割裂、歪曲、篡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本原理。毫不例外，列宁提出的文学的党性原则也被糟蹋得面目全非。他们搬出什么“三突出”就是党性原则的具体体现之类的昏话来欺骗群众、贻害青年，流毒所至，影响所及，迄今远未肃清。因此，结合批判“四人帮”的斗争实际，重新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本原理，应该成为当前文艺战线上一个不可忽视的课题。本文打算就文学党性原则提出的时代背景、历史意义、基本内容等问题，作一些初步探讨，确切地说，这只是个人重新学习经典论著

· 1 ·

《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的一点心得而已。

(一)

《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发表于一九〇五年十一月布尔什维克的《新生活报》上，那时正是第一次俄国工农革命运动迅猛发展的时期。

本世纪初，世界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肮脏勾当，仍在加紧进行。腐败贪婪的沙俄政府，勾结其他殖民主义同伙残酷地镇压我义和团的反帝爱国斗争，并派重兵霸占我幅员广袤的北满平原、物产富饶的辽东半岛和具有重大战略价值的军港要塞旅顺口。与此同时，日本帝国主义也凶暴地与沙俄争夺我国东北地区这块“肥肉”。日俄之间抢占殖民地的战争一触即发。

果然，一九〇四年一月日俄两个帝国主义在中国土地上火拚起来了。不久，沙俄惨败。

战争的失败，彻底暴露沙皇制度的腐朽，也加重了俄国工农群众的苦难，加深了广大人民对政府的仇恨，人民已到了无法求生的绝境。列宁说得好，旅顺口的陷落是沙皇专制制度陷落的开始。

矫健的“海燕”在俄国人民愤怒的海洋上空闪电般地飞翔，呼唤着革命风雷的来临。

“暴风雨！暴风雨快要爆发了！”

高尔基在《海燕之歌》中所创造的勇猛的海燕，成为迎接一九〇五年革命高潮的象征。

一九〇五年一月九日彼得堡的流血事件，揭开了这场革命风暴的序幕。这是一个星期日的清晨，十四万多工人和他们的妻子儿女列队上街，前往冬宫请愿，企求改善非人的生活境遇。

然而，沙皇尼古拉二世竟下令枪杀赤手空拳的游行队伍，当场被打死打伤的群众多达三、四千人。一场和平请愿的工人群众运动被淹没在血泊之中！这就是俄国革命史上著名的“血的星期日”。

工人的血染红了一九〇五——一九〇七年俄国革命的旗帜。革命恰似燎原野火，刹时席卷全国。工人运动急剧地从经济罢工转变为群众性的政治罢工，由和平请愿转变为游行示威直至武装冲突；农民运动不断扩大；士兵暴动相继发生。这一切都表明人民革命的条件正在成熟。

一九〇五年十月间，在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爆发了全俄政治总罢工，震撼了沙皇政权的统治基础。为了争取反革命重新集结的时间，沙皇政府采取了麻痹革命运动的反动政策，于当年十月十七日被迫发表了一篇承认言论、集会、出版自由的宣言。

流亡国外的列宁，一直密切注视着俄国革命形势的变化发展。对于沙皇的一纸宣言，列宁在一篇题为《革命的第一个胜利》一文中尖锐指出：“沙皇的让步确实是革命的极其伟大的胜利，但是这一胜利还远远不能决定整个自由事业的命运。沙皇还远远没有投降。”一九〇五年十一月初，列宁避过沙皇暗探的追踪，从国外归来，立即投入“十二月武装起义”的紧张准备工作，他通过一切可能的方式，不倦地教导俄国工人阶级和它的先锋队俄国社会民主党去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

在一九〇五年最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列宁主要通过《无产者报》和《新生活报》，发表了十几篇方针性指导性的论文，《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就是其中的一篇光辉文献。这些经典论著对当时俄国革命形势、阶级力量对比、战斗任务和斗争策略，作了极其深刻周密的分析。

这些分析表明,当时的政治形势,大致具有以下几个新的特征:

其一,革命的无产阶级“已经给俄国赢得了一半自由,它将要给俄国赢得全部自由,并且引导俄国经过自由而走向社会主义!”(《论党的改组》)

其二,革命“正处在两次战役之间的一个小小的间歇时期。中间道路是不可能有的。”(《两次会战之间》)

其三,党的活动条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集会、结社、出版自由已经取得了。当然,这些权力是很不巩固的。在这之前,无产阶级政党经常只是同那些职业革命家打交道,现在党要同广大的群众打交道了。这个变化,要求党不仅要改变宣传鼓动方法,而且要改变组织方法。

同这种革命形势的急剧变化相对应的,是文学阵线上敌我友犬牙交错、错综复杂的思想冲突和斗争。

在文学事业的广大领域中,由于工农革命运动的高涨,由于以高尔基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兴旺成长,产生了一种巨大的革命思想的冲击波,震撼了一些过去自认为远离人世波澜的作家,推动他们去参加当时的政治斗争。这种冲击波甚至也曾对象征派某些诗人如布留索夫等的创作一度产生积极的影响,动摇了他们的“精神革命”的信念,吸引着他们从颓废派唯美主义的梦幻中睁开朦胧的眼睛,向着周围波涛汹涌的时代洪流,投出了惊讶、困惑、向往和同情的一瞥,在他们的创作中曾留下良好的反应。但他们毕竟同真正的工农革命,同科学社会主义相去甚远,他们只打算和工农大众同行一小段路程,“破坏——我将和你们一道进行,建设——恕不奉陪。”这是布留索夫描述他和革命关系的有名诗句。列宁在《听听傻子的审判》一文中把这诗句的作者称之为无政府主义的诗人,而无政府主义作为世

界观则是“改头换面的资产阶级思想”。

革命给予另一个著名的象征派诗人勃洛克的影响更为深刻，以致在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后仍然同布尔什维克站在一边，写出了如长诗《十二个》这样热情洋溢的篇什，讴歌十月风暴。鲁迅在《〈十二个〉后记》里，既公正地称赞他的《十二个》是“十月革命的重要作品”，也准确地指出了诗人“究竟不是新兴的革命诗人”。

总之，一九〇五年的革命风暴，虽然对于象勃洛克、布留索夫等少数较优秀的象征派诗人起过不可忽视的好作用，但从象征主义这个世纪末的产儿的大多数信奉者的艺术实践来说，从这个流派所鼓吹的逃避现实生活、崇奉极端个人主义世界观和他们反对人民、否定革命的颓废思想的本质来说，最终还是跟无产阶级革命和革命文学背道而驰、相与为敌的。象征派是俄国文坛的一个较大的流派，它同当时俄国革命的复杂关系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至于那些形形色色的地主、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文人墨客们，对俄国的人民革命和无产阶级文学的勃兴，总是怀着极大的惊恐和仇恨的；他们崇拜极端个人主义，主张虚伪的超现实的“纯艺术”和“创作自由”；叫嚣不要党的倾向性，提倡什么“非党的革命性”、“无党性”之类的反动口号，以抗拒文学为人民革命事业服务的历史趋向。

在这种历史情况下，革命迫切要求从理论上政治上组织上整顿、改组党的文学事业，建立面向群众的新的宣传机构，并置于布尔什维克党的统一领导之下，以求适应急剧变动着的政治斗争和文艺思想斗争的新形势。

正是在这个火热斗争的年代，为了更加坚决地斗争，列宁及时地提出了“文学应当成为党的文学”的原则，也就是文学的党

性原则。

那么,怎样理解无产阶级文学的党性的一般含意呢?

在阶级社会中,阶级斗争发展到一定阶段,势必变成政治斗争。各阶级政治斗争的最严整、最完全和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各政党的斗争。现代社会中政党之间的斗争,提出了对党性的要求。列宁说,党性是“高度发展的阶级斗争的同行者和结果”,党性要求“在对事变做任何估计时都必须直率而公开地站到一定社会集团的立场上。”(《列宁全集》第1卷第379页)

无产阶级为了公开的和广泛的进行阶级斗争,必须发展严格的党性,而严格的党性则是使阶级斗争成为有觉悟的、明确的、有原则的斗争的条件之一。所以,概而言之,无产阶级的党性就是在高度发展的阶级斗争中逐渐形成的坚定的阶级立场,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严格的组织纪律性以及高度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也就是革命无产者的阶级自觉的集中表现。而无产阶级文学的党性,正是无产阶级党性在文学领域中的具体运用和特殊体现,它是无产阶级文艺事业的根本原则;它的提出,标志着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文学的形成。

根据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和其它有关文献中的论述,我认为文学的党性原则的主要内容应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加以全面地完整地理解。

(二)

列宁提出的文学的党性原则,规定了文学事业必须成为无产阶级总的革命事业的一部分,阐明了文学事业同整个革命工作的关系和联系,确定了文学事业在整个革命机器中的地位和作用。

列宁着重指出，对于革命的无产阶级，文艺只能成为革命的事业，党的事业，绝不允许成为个人、小集团或行帮谋私利的工具，这是关系到文艺的阶级性质的根本问题。同时，列宁又借助齿轮和螺丝钉同整部机器之间的关系的比喻，形象地说明了文艺对党的革命事业的从属性和不可分割的重要性。为了突出这个思想，列宁特地给“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这个句子里的语词“一部分”下面加了着重号，意思是说，正如齿轮和螺丝钉不能离开机器而独立运转一样，革命文学艺术也不能脱离党的整个事业而超然存在。

在这里，列宁给革命文艺运动提出并阐明了一项伟大的战斗任务，那就是，要求文艺事业在当时资本主义包围的环境下，努力摆脱资产阶级的奴役，“同真正先进的、彻底革命的阶级的运动汇合起来”，亦即同社会主义的工人运动密切联系起来，同无产阶级政党的解放事业配合起来，力求自觉地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服务。

列宁一向关心文学事业为革命运动服务的问题。一九〇五年初列宁在《革命的日子》一文中，对革命的政论家提出的要求是：要使自己对当代历史事件的描写，必须给直接参加革命运动的群众和战斗在第一线的无产者英雄们带来更多的帮助，促进运动的开展，并有助于革命人民选择最适宜的斗争手段、方式和方法。

后来列宁在有关的论文和书信中，继续强调和发挥这个思想。例如，他在一九〇八年革命低潮时期写给高尔基的一封信中指出：党现在需要有一个正常出版并能坚持不懈地同政治上颓废、变节、消沉等现象进行斗争的政治性机关报——党的机关报。列宁接着说，如果党的报纸办得不是那么单调，而是同当前的政治思想斗争紧密结合的话，那么党的工作就会从中得到极

大的好处；而著作家的工作如果同党的经常工作任务密切联系起来，也会加倍地得到好处。在同一封信中，列宁还强调要重视开展革命的文学批评，他说，要把文学批评也同党的工作、同领导全党的工作更紧密地联系起来，这样，才能抛开弥漫于当时文坛上的资产阶级老爷派头的恶劣影响，而为革命带来更多的利益。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把文学事业应当成为党的事业的一部分的原则同无产阶级专政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就是说，无产阶级文学不但要为工农大众夺取政权服务，而且更重要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的宏伟事业服务。

列宁在一九一八年九月十七日所写的《给无产阶级文化教育组织代表会议主席团的信》中，热情地希望无产阶级文化教育组织要在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帮助工人阶级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并认为“这是获得进一步的成就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最终胜利的保证。”（《列宁全集》第28卷第78—79页）

但是，工人阶级的文化教育组织和宣传事业怎样才能有效地帮助本阶级实现专政呢？列宁在《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一文中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认为，党的宣传机器——各种机关报刊，必须掌握在真正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的共产党人的手里，宣传大权不能旁落。其次，必须在宣传鼓动方式上，坚决地抛弃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的老一套，不是把无产阶级专政只当作背得烂熟的流行公式来谈论，而是通过在报刊上每天系统报道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活生生的事实，发现、探索、解决群众实践中不断产生的新问题。只有这样，我们的宣传鼓动才具有真正的共产主义性质。

对于党的文学事业必须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这一列宁主义的原则，高尔基在自己的文学活动中，不但在创作实践上身体力

行，作出巨大贡献，而且还结合着丰富的文学革命的经验，反复地作了理论上的阐述。他认为，文学应该帮助人民认识生活，因为“它是时代的生活和情绪的历史”，而文学家则是阶级的器官、阶级的感官，是阶级的耳目与喉舌，“他感受、体现并描写本阶级、本集团的心情，愿望，不安，希望，热情，利益，缺点和优点”。基于这样的认识，高尔基总是根据当年苏维埃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形势而为革命文学事业提出相应的政治任务，例如：

一九二九年，伴随着经济建设发展的需要，高尔基在文化建设的领域里提出“工人阶级应该培养自己的文化大师”的光荣任务。

一九三〇年，高尔基在号召文学应该注意描写各民族人民的现实生活时指出：“我们年轻的文学是在毅然为团结全体劳动人民成为统一的文化革命力量这个事业服务。这是一个崭新的任务，它的重要性是不需要证明的。”

一九三四年，高尔基在第一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讲到文学应该促进无产阶级的革命觉悟时说道：“发扬无产阶级的革命觉悟，培养他们对自己所创造的祖国的热爱并捍卫这个祖国——这是文学的重大职责之一。”

在列宁的长期关怀和教导下，高尔基几经阶级斗争惊涛骇浪的洗礼，终于坚持把自己毕生的文学活动献给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的壮丽事业。对此，鲁迅曾评论说，早在本世纪初，列宁就深知高尔基是“新俄的伟大的艺术家，用了别一种兵器，向着同一的敌人，为了同一的目的而战斗的伙伴，他的武器——艺术的语言——是有极大的意义的。”

如前所述，既然党的文学事业是帮助实现党的历史任务的特殊工具，“是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一翼”（鲁迅语），这就很自然给我们提出一个党对文学事业的领导问题。这个问题在《党的

组织和党的文学》中得到充分的论述，是构成这篇经典论著的又一个重要内容。

党的领导是整个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夺取胜利的根本保证，毫无疑问，也必然是革命文艺沿着正确方向繁荣发展的根本保证。因此，党的文艺应当接受党的领导，这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对于大多数群众来说，是不成问题的。但在列宁发表《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一文时，事情就不那么简单了了。

那时，俄国社会民主党党内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紧张而激烈。自从一九〇三年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以来，主要由于在组织问题和策略路线上存在着一系列严重的原则分歧与对立，再加上以马尔托夫和托洛茨基为首的少数派的分裂行动，致使俄国社会民主党在一九〇五年革命时期已经分裂成两大派别：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它们实际上各有自己的中央，各有自己的机关报纸。

孟什维克顽固地推行一整套机会主义路线，反对建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斗的党，主张拼凑个涣散的、无组织无纪律的修正主义的党。他们利用窃取过去的《火花报》等重要舆论阵地，攻击列宁的建党学说和布尔什维克的策略路线，鼓吹组织上的无政府主义，胡说党不应成为有组织整体，党内必须容许有自由的团体和不参加组织的个人存在；说必须让同情党的人以及每个罢工者都有自由宣布自己为党员的权利；公然反对少数服从多数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宣称党的报刊和其它文学工作不应受党组织的领导和监督。如此等等。

孟什维克的这种组织上的虚无主义和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曾受到列宁的严厉谴责。他写道：“这种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是俄国虚无主义者所特有的。党的组织在他们看来是凶恶可怕的‘工厂’；部分服从整体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在他们看来

是‘农奴制’……，他们一听见在中央领导下实行分工，就发出了可怜又可笑的嚎叫，反对把人们变成‘小轮子和螺丝钉’（并且他们认为特别吓死人的，就是把编辑变成工作人员）。”

由于处在这样的路线斗争的历史条件下，所以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中就特别强调指出，党要不失时机地利用已经取得的暂时的结社、集会、出版自由等新的政治形势，把党的各项事业的组织工作摆在首位，尤其要大力扩大和改造党的宣传工作，立即着手建立、改造和发展包括新闻、出版、图书等文化宣传机构在内的广义的文学事业，并将它们置于党的组织领导之下。因此，列宁要求：“文学事业必须无论如何一定成为同其它部分紧密联系着的社会民主党工作的一部分。报纸应当成为各个党组织的机关报。文学家一定要参加党的组织。出版社和书库、书店和阅览室、图书馆和各种书报贩卖所，这一切都应当成为党的机构，都应当请示汇报。”并且认为必须对那些藐视党纲党章，违反党纪，宣传反党观点的党员，给以严格的组织纪律的制裁。

由此可见，文学事业必须接受党的领导这个原则，几乎是和列宁的建党学说同时在斗争中形成的，并成为列宁主义建党学说的一个组成部分。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史上，这是第一次把文艺问题同无产阶级的建党学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理论创举。

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历史表明，困难还不完全在于要不要党的领导，这个问题，在我们今天的广大文艺工作者和群众看来，是不言而喻的，但，困难在于怎样领导，具体地说，是怎样实现党对艺术生产的领导。

文艺创作是一种复杂的个体性的精神劳动，有其固有的特殊规律。采用什么样的领导方式才能符合文艺的特殊规律，这

是一个关系到社会主义文艺能否兴旺发达的大问题。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中，在强调党的组织领导的重要性的同时，丝毫也没有放松这个问题，他指出：“文学事业最不能作机械的平均、划一、少数服从多数”，而且认为这是“无可争论”的公理。列宁还进一步说：“我们远没有想宣传什么清一色的制度或者用几个决定来解决任务。不，在这个领域中是最不能来一套公式主义的。”这就明确地告诉我们，对于艺术和艺术生产上的问题，不能凭借一般的行政方法，更不能使用强制命令的办法，而只能运用艺术民主的方法，在艺术的社会实践中求得解决。党的领导的责任，除了要确保文艺运动前进的方向和贯彻实现党的有关政策之外，就是要发动群众认真研究如何用民主的方法领导艺术生产，引导文艺家通过自由的争鸣、讨论、探索的途径来慎重解决艺术上的问题。在今天，我们贯彻艺术民主，就是要在事实上而不仅仅是在口头上落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只有这样，我们的文学才能象列宁所期望的那样，成为真正的“自由的文学”。

(三)

文学的党性原则还规定了无产阶级文艺必须为亿万劳动人民服务的方针。列宁指出，无产阶级文学事业“不是为饱食终日的贵妇人服务，不是为百无聊赖、胖得发愁的‘几万上等人’服务，而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

文艺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这是党的文学事业的根本方向问题，也是文艺史上的一次伟大革命。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人，也是创造文化的动力，高尔基说得好：“人民，不只是

创造所有物质价值的力量，他们也是精神价值的唯一无尽的源泉。”但是长期以来，劳动人民被剥夺了掌握文学艺术的权力，恰如他们在经济上、政治上无权的地位一样。列宁根据一九〇五年俄国第一次工农群众革命实践的需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革命文艺要正确反映劳动人民生活和斗争的思想，明确提出党的文学事业要为人民服务的号召。

《共产党宣言》早就向全世界庄严地宣布：“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一九〇五年俄国第一次革命的爆发，不但在政治领域同时也在文学领域证实并补充、发展了这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早在这次革命的准备时期，列宁就说过：“我最大的希望和幻想得最多的就是能够给工人写作”（《给巴·波·阿克雪里得》，《列宁全集》第34卷第6页）。为广大的代表着当代先进生产力的工人阶级而写作，这是列宁对于发展党的文学事业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

在第一次俄国革命期间，布尔什维克的各种报刊都对革命的文学问题给予了应有的注意，这是因为在列宁的指导和影响下，它们认识到文学事业是对广大工人群众进行政治教育和组织斗争的重要武器。“无产阶级艺术的权威”（列宁的话）高尔基以其不朽的名篇巨什，十分清晰地体现着列宁关于党的文学原则的这一深刻思想。

在革命斗争如火如荼的一九〇六年，也就是在《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发表后的一年，以反映工人群众团结战斗为主题的剧本《仇敌》问世之后，高尔基紧接着又出版了长篇小说《母亲》。这部杰作划时代地揭示了工人阶级在布尔什维克党的教育和领导下，从旧制度自发的反抗者到自觉的社会主义战士的成长历程，真实地描写了在俄国革命早年时期的狂飙烈焰中，锻炼出来的